



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

军事政治学研究

2013年第1期（总第1期）

李月军

“党军共生”背景下的多重实践

李海涛

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形成的历史逻辑

刘宗胜 李世源

军事管制：“文革”时期军队的地方政权功能

蒋乾麟 等

科学分析无产阶级军队党的领导体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

军事政治学研究

2013年第1期（总第1期）

李月军

“党军共生”背景下的多重实践

李海涛

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形成的历史逻辑

刘宗胜 李世源

军事管制：“文革”时期军队的地方政权功能

蒋乾麟 等

科学分析无产阶级军队党的领导体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事政治学研究. 2013年第1期:总第1期/高民政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097-5528-0

I. ①军… II. ①高… III. ①军事-政治学-研究 IV. ①E0-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1839号

军事政治学研究 (2013年第1期 总第1期)

主 编 / 高民政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高明秀 许玉燕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韩海超

项目统筹 / 高明秀 许玉燕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2.5

版 次 / 2014年2月第1版

字 数 / 231千字

印 次 /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528-0

定 价 / 4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军事政治学研究

MILITARY POLITICS REVIEW

主管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政治学研究中心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邦佐(复旦大学)

俞可平(中央编译局)

蒋乾麟(南京政治学院)

学术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兴卫(军事科学院)

王浦劬(北京大学)

王 萍(空军工程大学)

王臻荣(山西大学)

朱仁显(厦门大学)

朱光磊(南开大学)

刘 杰(上海社会科学院)

刘戟锋(国防科技大学)

关海庭(北京大学)

安成日(黑龙江大学)

孙 力(南京政治学院)

杨小云(湖南师范大学)

杨玉玲(西安政治学院)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

李月军(中央编译局)

李 承(南京政治学院)

李保忠(西安政治学院)

李路曲(上海师范大学)

肖冬松(国防大学)

肖 滨(中山大学)

佟德志(天津师范大学)

宋玉波(西南政法大学)

张 云(南京政治学院)

张凤阳(南京大学)

张贤明(吉林大学)

张明军(华东政法大学)

张星久(武汉大学)

张振江(暨南大学)

张理海(西安政治学院)

张新平(兰州大学)

陈明明(复旦大学)

苗润奇(空军指挥学院)

林尚立(复旦大学)

金太军(苏州大学)

周 平(云南大学)

周光辉(吉林大学)

周敏凯(同济大学)

郎友兴(浙江大学)

房 宁(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 勇(海军舰艇学院)

胡 伟(上海交通大学)

胡 键(上海社会科学院)

秦维宪(上海市社联)

徐 勇(北京大学)

徐能武(国防科技大学)

郭志刚(军事科学院)

郭定平(复旦大学)

唐亚林(复旦大学)

桑玉成(上海市社联)

黄细麟(上海国际军街博物馆)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

萧延中(华东师范大学)

商红日(上海师范大学)

蒋建新(南京政治学院)

韩冬雪(清华大学)

傅婉娟(国防科技大学)

封面题字:李 铎

主 编:高民政

中文审稿:李秋发 李海平 翟桂萍 薛小荣 李书吾 范 彬 朱加荣 魏延秋

英文统稿:李庄前 李丛禾 付畅一 王永强 张小健 刘鹄斐然 梅 娟

地 址:上海市四平路2575号

邮政编码:200433

联系电话:(021)81810527(民线);(0531)810527(军线)

电子邮箱:jszzxyj@163.co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 特稿 ●

“党军共生”背景下的多重实践

——1927~1934年中共的军队政治工作与党军关系 李月军 / 1

● 专论 ●

试论毛泽东政治建军思想及当代价值 李保忠 刘 越 / 28

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形成的历史逻辑 李海涛 / 51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逻辑分析与现实启示 张武波 / 64

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沿革与最高领导指挥权制度的实行 岳智慧 / 72

军事管制：“文革”时期军队的地方政权功能 刘宗胜 李世源 / 91

台湾地区军政关系之演变

——对国民党军中党部的分析 周建勇 / 102

中西方“政党-军队”耦合模式之比较研究 陈小莉 / 117

美国军队的“政党倾向”及其政治参与活动解析 王永强 / 125

国际军事力量在苏丹政治秩序重建中的作用

——苏丹达尔富尔维和行动前景展望 蔺春来 / 136

● 短论 ●

坚决听党指挥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重要政治优势 兰允礼 马怀军 / 142

● 综述 ●

武装力量与政治研究：军事政治学的兴起与进展

——首届军事政治学专家论坛（2010）综述 杨亚斌 / 148

• 动态 •

大卫·派恩-柏林论拉美国家的国防机构和军政关系 周 静 / 154

• 书评 •

《政治与俄罗斯军队：1689~2000 年的军政关系》译介 翟桂萍 / 166

• 专访 •

科学分析无产阶级军队党的领导体制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长蒋乾麟空军少将访谈录

..... 蒋乾麟 范 彬 / 172

• 资讯 •

2012 年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论文索引 (一) 韩洪泉 / 180

《武装力量与社会》2013 年 1 月号目录 范 彬 / 189

• 稿约 •

征稿启事 《军事政治学研究》编辑部 / 191

● 特稿 ●

“党军共生”背景下的多重实践

——1927~1934年中共的军队政治工作与党军关系

李月军*

【摘要】1927~1934年间，经过艰难努力，共产党建立了一支自己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并在组织制度层面基本实现了对这支军队的领导和控制。在以党领军的同时，党及其革命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也离不开军队的护持。这样，党军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共生关系。不过，这种共生关系，特别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控制的稳定与巩固，并使其按党的意志行动，达到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目的，还有赖具体的军队政治工作实践。但相关档案资料透露出来的信息告诉我们，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内中共军队政治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在实践层面出现了不稳定的现象，存在区域性的差别，党对不同武装力量形态的领导和控制程度也不尽相同。这些问题和差异，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党军关系的基本制度设计与具体实践过程也存在一些需要不断发展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军队 政治工作 共生关系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敏锐地认识到，没有切实地掌握军队是造成革命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并开始提出共产党如何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并实现对军队的领导的具体认识，认为革命的党与其领导控制的军队是一种共生关系，即没有自己领导的军队，党及党的革命运动断无成功之可能，没有坚强的党也不可能建立一支属于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然而，在实践中建立党对军队的领导，使军队能够坚决执行党的意志，并不是只通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理论认识，或简单的组织制

* 李月军（1973~），男，山东茌平人，中共中央编译局战略部副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中国历史与政治。

度设计就能实现的,更重要的是需要党对军队进行日常的不间断的教育与控制来实现,而这主要是靠军队政治工作实践来完成。已有的研究不是只关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以党领军理论的建立及其内部争论,^①就是过于关注军队中党的具体制度设置和政治工作经验的总结,而对不同地域和共产党领导下不同类型的武装力量中党与军队的具体实践,几乎没有论及。这样一来,对这一时期党军关系与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所勾勒出来的是一幅模糊图景,不能使我们对具体历史场景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与判断。本文依据较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从微观视角体察不同层面上党军关系建设的具体实践,试图揭示1927~1934年间,中国共产党建立对军队领导权的实践逻辑。本文认为: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党已经基本建立了对军队的宏观领导与控制,另一方面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队的强弱与战争的胜负,有时党的生死甚至还取决于军队的行动,在个别案例中还存在党军之间的冲突。这样,共产党和军队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党军共生关系在具体实践中还暴露出初创时期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而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并没有全部得到及时有效而持续的解决,致使党对军队的领导与控制在当时还不是十分稳定和巩固。

一 以党领军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多重实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反思党军关系的同时,也在实践中开始探索如何建立一支由党领导的执行党的意志的武装力量。在中共中央提出一些建军原则和设想的同时,“各地红军在斗争实践中已经遇到了许多建军的具体问题,迫使他们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解决”。^②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建立党对军队的领导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探索过程。同时,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党对不同的武装力量(正规军红军以及地方武装,如游击队、赤卫队、独立师、独立团、独立营等)的领导与控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从而使具体的党军关系呈现出一种多重而复杂的状况。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时期内,尽管党意识到建立自己军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控制权和领导权呢?首先要从组织上进行控制,因为“军中党的

^① 参阅《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201~210页;朱廷川:《1931年红军党委制取消的原因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俞雨霖:《共军与中共政治:历史的角度》,《东亚季刊》1986年第2期。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第32页。

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必须依照从前的组织系统——团成立支部下分小组，师成立委员会——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行动”。^①但对如何以具体的机制和制度控制这样一支军队，不同的时期，党有不同的认识，还处于探索之中。在初期建立的几支革命军队中，党对军队的领导并没有稳定地建立起来，军事指挥官与党代表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党对军队的组织化控制、日常的政治训练与教育不能切实有效地进行。南昌起义军的一部，“自南昌出发至流沙失败三个月钱蔚（代理中央）仅在瑞金开始组织支部，汀州召集同志开会，立三同代英作了一次报告，此外并没有什么，一切同志的行动都是政府机关的行动，并不是党的行动，一切决定都是钱蔚的几个负责同志，其他同志概不知道，亦不能过问，一般同志对于负责同志仅有下级职员与上级职员的关系，并无同志与同志的关系。并且同志彼此互相排挤的也有。因此有同志怀疑不满而思归者”。“此次行动中间只有个人的活动，没有党的活动，一切事件及决定仅少数中央委员知道，其余同志都是被动，因此同志机关化，做事不负责，也不问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干，横竖有他们中央委员就够了。行动也不一致。”“党的力量表现薄弱，在军队中党的上级机关政策动摇。”^②广州暴动时，“党的指挥机关缺乏指挥工作。在暴动各种工作中间，几乎见不着党，除了个人的乱跳一场外，没有一个健全的组织机关来领导一切”。^③

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残部中，原来每团虽有一个共产党支部，但属机关性质，既不能领导部队，也没能组织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原来连以上虽设有党代表，但沿袭的是国民革命军党代表制度的职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且与军事长官矛盾重重；旧军队的陋习依然保持，军官们生活待遇特殊，并任意打骂士兵，官兵关系十分紧张。^④三湾改编后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和一些地方武装中设立了党代表制度。不过这这与国民革命军的特别党部制度和党代表制度自成垂直体系不同，在保持党代表与同级军事长官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的同时，^⑤二者还是党的委员会领导下的分工协作关系，更体现

① 《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一）（1927年1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第34页。

② 《刘子谷同志关于南昌起义部队于潮汕失败经过情形的报告》（1927年10月19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1986，第48~49、40页。

③ 《广州暴动的经验教训》（1928年1月），《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第8页。

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第32页。

⑤ 如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工农革命军的任务与组织决议案（1928年1月30日省委党委通过）中指出：“工农革命军从中队起均须设立党代表，挑选工农同志担任。其任务是代表党的意志，帮助与监督军官的工作，并且在军队中扩大党的政治宣传，进行士兵的政治训练。”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甲5，湖北省出版总社，1986，第113页。

了党的集体而不是个人对军队的领导。

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建立后,这些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如在鄂东的黄麻区,“党军形成对立之势,群众没有组织,党内有纠纷(军党之争)”^①。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到达井冈山初期,也面临着士兵多来源于俘虏与农民,游民成分太多,战斗频繁,伤亡大,且“兵有伤、亡、病、逃,损失甚易”等问题。在这种情形下,毛泽东指出,只有坚持党代表制度,“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却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②实践证明,这种坚持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与训练的经验是有一定作用的,特别是在部队内外环境很不利的情况下,更是如此。1929年初,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总结了红四军的经验,认为尽管红四军“成份非常复杂、质量不太十分好,流氓的色彩当然仍然有的,不过根本没有饷发,雇佣式的性质还算极少。军中的训练还不错,兵士对革命二字,还有相当的认识,普通的政治常识,却还有一点儿”。^③“党组织,由上而下说,由军委而团委、营委,连设连支部,各班自成一小组,这个组织我们觉得很得法,很能适用于斗争,因为作战大部分以连为单位,每一个作战单位有一个支部,去处理和指挥一个作用单位的事,很觉便当,我们的军队其所以打败仗而不至于溃散,这个组织的好处,应为主要的原因。红军中党的历史已有一年,有些支部还能作用,能在群众中做核心,使群众受我们的影响而团聚在我们的周围去工作,党的会议除作战外,小组会有每星期一次,各级代表会,也能常开并能按期开,对党员还有相当的训练,由党代表负其责。”^④

但关于党与军队关系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就此完全得以确定和统一。后来,在红四军内部发生了一场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的争论。毛泽东将这一争论归纳为“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⑤这

① 《刘少道、余泽鸿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3日),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甲5,湖北省出版总社,1986,第624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27~28页。

③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32页。

④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34页。

⑤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201页;《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第55~56页。

一争论最后在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得以解决，并以决议案的形式明确，最终在理论认识上确立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厉行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此后，决议所体现的党军关系理论不但在红四军得以实行，而且其他各部分红军也照此来执行。然而，把清晰的理论认识落实到具体实践的过程是复杂而艰难的，在建立党对军队的控制与领导的具体实践中，党对军队领导和控制的程度表现出较大的地域性，对不同的武装力量类型的掌控也存在不小差别。

就地域性而言，一般来说建立较早的比较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中的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主力，各方面的制度建设比较完善，政治训练深入，党对军队的掌控也比较强。如在第四军，“党的基础甚健全，各种会议能按期召集，并能提出许多实际问题讨论，……党内外工作都很有条理，尤长于群众工作”。^① 1931年9月3日，《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指出，“红军中一般政治教育，平时每日都有政治课，由政治委员领导，遇有纪念节或特殊事件即召集大会”，“总括的来说，这个中国红军的主力军，是好的，是一天一天进步的，指挥给养都是绝对统一的，团结一致的，我们党完全可以掌握得住，完全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奋斗的”。^② 当然，这并不是说主力红军的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已经十全十美，实际上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还存在许多问题。1932年9月21日，总政治部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的训令中指出：“目前红军中党的纪律，异常松懈，党、团员破坏纪律的现象（如开小差、私打土豪、临阵畏缩、违抗命令……），这显然存在，这是削弱党在红军中领导的最好办法。”^③ 就是到了1934年，在党的领导较强的红四军，军队的政治工作也明显地存在较大的缺点和弱点，与军事发展相比较为滞后，具体表现在：党政机关不健全、组织薄弱、支部工作不健全、政治教育工作不深入、忽视党政工作的危险、白色士兵工作没有视为党政的中心工作之一、地方工作不充分、反帝工作不够。^④ 在主要革命根据地和主力红军中，党对军队的领导

① 《张怀万巡视赣西南的报告》（1930年4月5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204页。

② 《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373、376页。

③ 《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的训令》（1932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第213页。

④ 《红军第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工作决议》（草案）（1934年10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第940~941页。

和军队的政治工作尚且如此,在一些建立相对较晚、不太稳定的革命根据地中则更为严重,这些根据地红军的建设起步较晚,相关制度不太完善,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不巩固,甚至还存在党不能完全控制军队的情况。

1929年9月,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贺龙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湘鄂西苏区的各种武装力量虽达四千之众,但红军“政治的、军事的训练均未加紧”,“红军军人缺乏政治、军事教育,故纪律不严,敌友不分,有些行动不能完全照党的策略去做”,“军队中党的教育没有经常的注意,很多新同志还不知道党究竟是什么”。^①两年之后,湘鄂西苏区红三军中党的政治工作并没有深入,党对红军的领导仍不强大,“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可说完全没有。政治工作所做的,仅仅是对外一点宣传工作”,^②“三军在过去可以说没有政治工作,军队政治部以及七、八师政治部,都是空洞的一个形式机关,所做的除贴标语、发传单而外,看不见其他工作,各团仅有宣传队没有政治部的组织,各连指导员都没有什么工作,而且还有很多连根本没有指导员,是党来做内部工作,政治部做对外宣传工作、政治机关没有系统上的工作关系,一切问题完全集中支前委或各师师委解决,惟其政治工作的缺乏,所以官兵的悲观失望的情绪很浓厚”。^③到1934年8月,湘鄂西的红三军“在政治工作上、在军事上都有极大的进步和转变,但是自由主义的倾向,军阀制度残余的倾向还部分的表现着,失败情绪也没有完全消灭”。^④在闽粤赣苏区,尽管“红军政治上都已得到相当的成功。一般指挥员战斗员都能了解斗争的任务,表现出绝大决心与敌人奋斗。各地党部对扩大红军工作亦已有初步工作之成功”,但“红军中党的领导异常薄弱”。^⑤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红军经过斗争和努力,军事上政治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1930年底和1931年初,湘赣省委明确指出:“严格说来政治委员制度还未真正建立起来,政治委员的成

① 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32)》甲2,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第477页。

② 《万涛自永隆河给湘西省委信》(1931年10月5日),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32)》,1986,第117页。

③ 《中共湘鄂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10月15日),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32)》甲2,1986,第121页。

④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1934年8月4日中央分局会议基本通过),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1934)》第1册,1986,第408页。

⑤ 《中共闽粤赣苏区特委决议——关于加强红军中党的领导与扩大红军问题》(1931年5月),福建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1930.2~1935.12)》(第一辑),档案出版社,1987,第81、82页。

分与政治认识，还不能保障真正共产党的领导。”^①“政治委员的成分和认识还不能说真正共产党的领导，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作用非常不够，党员的政治水平和政治积极性很低落，政治部的工作没有建立起来，红军干部缺乏更成严重问题。”^②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十军中，“政治工作是非常之软弱的，无论在苏区或白色区域，政治部对于工农群众的政治工作，在客观上完全是怠工的态度”。^③1932年11月12日通过的《中共湘赣省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红军与地方武装问题决议案》中又指出，红军中工作还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主要的是政治委员制度没有坚强地建立：游击主义的传统，没有彻底的肃清；组织上一般的松散；……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也很薄弱。一年来没有开展广大的苏区本身的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也无长足的进步表示着党的生活不健全，党员领导作用很薄弱，党的发展也迟缓，党对红军的政治文化宣传教育也松懈”。^④

红军中党的具体领导和政治工作存在上述问题导致了许多不良后果，最为严重的是军队中党的命令和军事意图难以落实。1933年5月10日，朱德、周恩来在关于必须严格执行命令的训令中指出，“我们红军有些部队尚存有游击习气，对于上级首长所发布的一切命令、训令大半没有负责传达，使之深入到每个红军军人中去，更很少检查其执行程度，因之各部队党不能达到百分之百地去执行上级首长的命令和训令，甚至有把命令和训令视为废纸藏到公文箱内，而不去传达与执行。如最近我们检查，总直属队竟有多数单位完全没有传达上级首长的命令、训令，以致一般战斗员及工作人员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何等严重的现象，而这些现象绝不能再容许一秒钟的存在，必须立刻纠正过来”。^⑤

更有甚者，在鄂豫皖苏区发生了红军与地方党组织、苏维埃及群众团体的冲突。1931年6月19日，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在《关于工农红军与各级党的组织、苏维埃和

① 《目前政治形势与战斗任务——中共湘赣省委第二次执委会决议案》（1931年12月16日通过），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第288页。

② 《中共湘赣省委报告》（1932年1月12日），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第262页。

③ 《中共赣东北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案》（1931年7月22日通过），江西省档案馆选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252页。

④ 中共湘赣省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红军与地方武装问题决议案（1932年11月12日通过），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第35页。

⑤ 《朱德、周恩来关于必须严格执行命令的训令》（1933年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第382页。

群众团体的关系问题》的通告中指出,“中央分局最近接得各方报告,知道红军与地方党的组织、苏维埃及群众团体关系不好。军委特务队熊学习对孝感党负责同志表示不尊重态度,三十九团与罗委互相作不负责的批评,三十八团某连长骂高桥区84党部的负责同志。……这些都表明红军中有许多同志甚至于上级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对于红军路线尚有这样不正确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中有些负责同志和士兵个人,对于党和苏维埃的轻蔑绝不是偶然的”。“在鄂豫皖苏区红军以及军中许多负责同志和一般的武装组织,对于共产党和苏维埃的不尊重态度,有长久的历史根源。”^①同样的现象也在鄂西苏区存在着,红三军“可以说没有红军政治工作,造成‘私人’、‘私枪’、‘私钱’、‘私物’以及对兵士打骂等军阀制度的残余,红军同群众以及同地方苏维埃的关系非常恶化”。经过整顿后,红军与地方党的关系有相当的进步,但还不充分,“政治部一般的还是不健全”,“私枪私物与地方党部不好的现象时常发现着。红军中党的工作也做得非常不够,一般党员在战争与日常行动中很少起到领导作用”。^②

在正规红军中党的领导和军队政治工作都存在上述问题,一般来说,地方武装中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就更差,在一些地方,党对基层武装远没有达到同如臂使手、如手使指的程度。^③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刘士奇在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说,“二十军是地方赤卫队编成的,军事政治干部非常不够,地方主义的色彩比较要浓厚点,政治水平比三军还差得远”。^④一年多之后,情况似乎并没有改善的迹象,特别是在许多新发展区域中更是如此。1932年5月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对地方武装问题的决议案中对此有详细论述:

① 《鄂豫皖中央分局通告第五号——关于工农红军与各级党的组织、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的关系问题》(1931年6月19日),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1932年)》甲1,1985,第85页。

② 《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1932年12月19日),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1934)》第1册,1986,第306~307页。

③ 各根据地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大体上可分三类:一是正规红军或称主力红军,它的成员和活动范围不限于某一根据地内;二是由本地脱产农民为主组成的游击队,可在根据地内流动作战,必要时协助正规红军或自身进行较大战役;三是平日为民、战时为兵的赤卫队,基本职责是保卫本地的村、乡或县。随着地方武装力量的壮大后来又出现了独立营、独立团和独立师之类的武装。参阅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第196~197页。

④ 《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358~359页。

“现有的游击队独立营或警卫连等，表现一种军阀残余的行动，公然压迫政府，压迫群众，剥削群众，不听上级调动，不听政府命令，各自为政，独行专断。”“各地苏维埃的地方主义，完全掩护了这种太平保守拥兵自卫的倾向形成，反对统一领导及集中指挥。”“军费不统一，地方武装中大部分干部生活腐化士兵生活痛苦，而财政耗费则非常浩大，财政来源常是破坏苏维埃的正确的经济政策竟至侵犯中农贫农，至于无预算决算以及报销审查等更是各地常有之事，地方苏维埃未在省苏领导下统一财政是直接帮助军费紊乱的现象。”“这些错误的形成主要是来源于地方武装缺乏政治领导，及地方政府的监督，因为地方武装经常在单独行动中，政治工作及政治委员制度没有建立，有脱离政府脱离群众而逐渐走上腐化或反革命道路。”^①

同月，《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也指出这样的问题：“独立师独立团的干部缺乏，政治委员制度未普遍的实施，政治教育很缺乏，游击主义的残余还很浓厚，地方观念、地方党和地方政府拥兵自卫的观念还存在，党的领导还不强壮，对于工作的转变，尤其是在独立团中成效还不大。”^②

同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关于为加强和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的决议中更为详细生动地叙述了地方武装中存在的问题：

地方武装，“一到白区便乱捉人，乱抢东西，到处都是表现绝不容许的侵犯中农贫农利益，脱离群众的盲动行动，甚至形成赤白对立。沿永河自乐安到公路这一线，万崇坪古县、冠山、汀乌江，这些地方原来是很热闹的圩场；到现在有屋无人住，有田无人耕，变成一片荒野地方。安远、南丰县的白区边界的群众，一见红军就跑光了，什么东西都搬去，到处都向我们打枪，捉杀我们的红军病兵，及落伍士兵。过了一百多里路，深入白区到处很好，什么东西都有买，群众拥护红军非常热烈。宁都之田头虎井天一带群众怕游击队警卫连，一去便跑，不怕红军；

① 《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对地方武装问题的决议案》（1932年5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613～615页。

②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165页。

南广甘竹之线赤卫军开进前线配合红军作战,一到赤区边界白舍一带便乱抢一顿,把所有群众家里的东西,都抢光了,甚至碗筷都拿尽了。其他各地的武装,都表现一进白区便是五种单纯的筹款观念,狭隘的经济主义,乱打中农、贫农,形成一种土匪行为,像这样脱离群众的非阶级的盲动行动,不但不能配合红军向北发展扩大苏区,反而要妨碍红军的行动,妨碍苏区的扩大,这简直是反革命行为”。

“就今天来说,游击队只能至赤白边界出入捉土豪,还没有看见深入白区,扰到敌人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斗争,扩大新苏区的游击队,这是我们游击战争最大的缺点。”^①

在湘鄂西苏区,1932年底的总结认为,“各县游击队还是处于很腐败的泥坑中,根本谈不上什么政治工作,乱没收的现象是一般的存在着,浪费、贪污还是异常厉害,特别是同女人不正确的关系,以致引发农民的不满”。^②近两年之后,湘鄂西的各独立团,虽然取得了几次英勇的胜利,“最主要的是内部政治工作之极端薄弱,党的发展组织之迟缓,所以不能克服开小差的现象和吸收新的群众的参加,战士的数量反而减少了”。^③

1932年11月,中共湘赣省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指出,“各县对独立营游击队的领导,简直到了不可容忍的忽视”。^④1934年2月10日,湘赣军区第二次首长会议专门对本区的独立团营游击队政治工作进行了分析与总结,指出,严格检查在冬季三个月中我们独立团、营及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一般是有进步的。

“但这一进步还表现出非常迟缓和不平衡的状态,一般独立营游击队的政治工作,是要比独立团差,个别独立营游击队,不但没有进步,而且表现极严

①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为加强和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战争的决议》(1932年9月30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第645~646页。

② 《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1932年12月19日),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1934)》第1册,第309页。

③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1934年8月4日中央分局会议基本通过),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1934)》第1册,第407页。

④ 《中共湘赣省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32年11月12日),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第23页。

重的现象。”“个别主要负责人对政治工作的认识非常薄弱，各独立团营游击队的支部工作是没有获得应有的转变，党团发展迟缓，有部分游击队还没有党的组织。开小差和个别反水现象，在部队中还未完全消灭……游击主义在部队中表现非常严重，军阀残余、破坏苏维埃经济政策、违反阶级路线等脱离群众行为，在个别部队中还继续发生。散漫极端民主化，还没有完全克服……政委制度还未完全正确的建立，反对政治制度，反对政治工作……个别部队还继续发展。”^①

十六军也是由地方武装组建的，尽管它正从斗争中日益坚强起来，但对“真正造成红军为铁军还差得远，然而这不是增加几个干部的问题，这是湘鄂赣苏区整个党的问题。我们要问你们对于红军的改造做了些什么工作，政治工作没有建立，九团有十六连只有一个连指导员”。^②

上述各苏区地方武装的问题，引起了红军总政治部的重视，并于1932年9月21日发布训令指出：“地方武装——游击队、独立团、独立师和带地方性质的军（如二十一、二十二军）中，无产阶级和党的领导比较主力红军还要薄弱百倍，政治上工作尤其是党的工作异常落后，党、团员脱离群众、破坏纪律和贪污腐化的不良现象特别严重，党、团员开小差的层出不穷，逃兵的数目十分惊人（如南丰、广昌）。”^③1934年2月7日，朱德在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赤少队游击队政治工作还差得很，甚至还有拖枪反水的，这是政治工作不够”。^④同月9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题为《为着巩固红军，必须改善政治工作》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方面军中有少数不执行命令的，游击队、独立营、独立团也有不能配合主力红军行动的。为什么发生这种现象？不单是军事上的原因，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⑤

总之，共产党苏区党军关系不正常的具体现象与军队政治工作不力问题，体现了共

① 《独立团营游击队政治工作——湘赣军区第二次首长会议通过》（1934年2月10日），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第662~664页。

② 《中共湘鄂西分局给湘鄂赣省委的信——关于苏区党的中心任务，革命战争的准备，土地、经济政策，加强白区及白军工作，党的改造等问题》（1932年），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1934）》第1册，第128页。

③ 《总政治部关于红军中党的工作的训令》（1932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第217页。

④ 《红星》第28期。

⑤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第112页。